

绪 论

每一个文明人，无论他的意识发展到多么高级的程度，在其精神的更深层次中仍然是一个古代人。

——《荣格作品集》第 10 卷

荣格心理学的核心观点是，在我们的意识理解力之内，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力在发挥作用——这是人类逐渐形成的理解力。通过使这个精神的种系发生的成分人化为一种古老的存在，或“在我们大家心中的那个 200 万岁的人”，荣格便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念珠般的逻辑学家的愿望，这些逻辑学家想谴责他陷入了侏儒的谬误之中——就是说，他相信他有一个很小的老人坐在那里实施控制。但是荣格并没有因这种妄想而苦恼。在他看来，这个 200 万岁的人是对位于人的存在核心的一种古老的原动力的生动隐喻，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进化遗传而形成的。他是在和尼尔斯·波尔同样的态度上加以应用的，波尔曾把原子比作一个“微小的太阳系”这两种比喻都是想要创造一种关于

否则便无法看见的东西的工作意象的有效尝试。

荣格发现,种系发生的(生物进化的)精神所由之组成的那些原型单位在梦和幻想中是以拟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所遇见的不是作为理智的抽象观念的男性化、女性化、邪恶或智慧,而是作为具有它们自己的人格和意图的人物形象。当荣格在他的病人和他自己身上遇见它们时,他便把它们命名为阿妮姆斯、阿妮玛、阴影、智慧老汉和智慧老妇人。这个 200 万岁的人是另一个这类似人化的表现:这个古老的存在并没有在我们的头脑中有任何物质形式的存在,更不用说“灵魂”或“无意识”了,但是,作为我们的进化遗传的现象学的具体体现,可以把它理解为在我们个人生活的戏剧中起着某种必不可少的作用,是作为人的一个伙伴而表现出来的。我已经知道,我们是能够认识、热爱和亲近这个伙伴的。

荣格心理学的一种力量(也是一个严重的危险)是它对奥秘事物的喜爱,它要走自己的道路的意志。遗憾的是,这种依靠自己的无畏精神可能会导致那种心理上的眼界狭小,詹姆斯·赫尔曼就是这种观点的如此坚定的拥护者。在他那本具有迷人挑衅性的书《梦与地下世界》中,他宣称:“深度心理学的传统就是呆在家里,并随其进展而创造它自己的基础。”对于想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心理学来说,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一个空想的基础,一个只适合于建造空中楼阁的基础。为了想证明这种多少有点像广场恐怖症的传统,赫尔曼宣称,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公开放弃了把解剖学、生物学、自然科学和神学作为他们的学术活动和主张的基本前提。”^[1]但是这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当然也不会放

弃所称的前三种学科。弗洛伊德之所以选择要呆在家里，是因为在他看来神经生理学的发展还不足以使他提出他最初所设想的“一种科学心理学的设计”。事实上，他的精神分析的系统阐述深受他在伟大的欧内斯特·布吕克的实验室里工作了六年所获得的神经生理学知识的影响。和弗洛伊德一样，荣格承认“这种‘精神红外线’，即精神的生物本能的极点”的基本重要性，这种精神红外线“逐渐转变为有机体的生理学，并因而与其化学和物理的条件相结合”。^[2]荣格把原型的这种生物学的极点比作性格形成的“行为模式”，并宣称它是“科学心理学所适当关注的东西”。^[3]

我可不愿意呆在家里，我愿意让我们大家深入到遥远的过去、从地平线上的道路进入远离西方心理学传统的文化中去进行一番游历。我也不想把我们自己限制在相对较近期的苏美尔、埃及、希腊或罗马的过去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我愿意回到更久远的过去，回到我们的精神所由之形成的靠狩猎和采集而生存的时代，回到所有人类经验的原型基础，回到继续在我们的心灵和大脑的结构中生活的人种的、哺乳动物的和爬行动物的祖先那里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荣格的那个 200 万岁的人内部发现一个一亿四千万岁的脊椎动物，它会对我们的有限存在提供支持，并且使我们的梦富有生命力。

注释：

[1] 詹姆斯·赫尔曼：《梦与地下世界》，第 6 页。

[2] 荣格：《荣格作品集》第 8 卷，第 420 段。

[3] 荣格：《荣格作品集》第 18 卷，第 1228 段。

第 1 章

认识不可知的事物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在心,我们所谓的“原型”其本身是不能被描述的,但其作用在于能使我们对它进行想像,这就是原型意象和观念。我们在物理学中遇到了一种类似的情境 在物理学里最小的微粒本身是不能被描述的,但它们具有影响和作用,从这些作用的性质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模型。

——《荣格作品集》第 8 卷

对理解的一种强烈欲望

作为受过教育的西方社会的成员,我们享有许多共同的假设:其中一种假设是,我们能够潜在地认识一切可以认识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开始把认识推向其极点,

并且询问诸如什么是‘认识’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任何事情之类的问题时，我们才从这种幻想中摆脱出来。在宇宙开始存在之前存在着什么？所有创造物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任何事物存在？当我们提出这类问题时，我们开始明白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它们超越了我们掌握、认识甚至想象的能力，更不用说也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但是，这些问题是那种能引起小孩子们的兴趣的问题。正如所有的儿童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一样，他们也都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他们提出的那些天真的问题常常具有某种深度，以至于即使花费毕生的精力进行研究也难以了解。为什么会有地球？上帝从哪里来？什么是死？我们为什么非要死不可？什么使我们活着？妈妈，在爸爸把我放在你的肚子里之前我在哪里？当我在 5 岁时向我的母亲提出这个问题时，她那令人震惊的回答——“我不知道，宝贝”——促使我第一次产生了积极想像的经验：我曾对着一片云进行无尽期的等待，等待着把我召唤到我父母的卧室——这是极其令人厌倦的。这种经验教导我，我能在这里是一件多么像奇迹一样的事啊，生命是多么宝贵啊，一个人必须怎样热爱生命，并且欣赏所度过的每一天。

对起源问题的关注使儿童具有了神话学和认识论的倾向。他们大多数人之所以失去了这种倾向，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成人并不享有这种倾向。然而，有少数人却从未停止过这种认识论的探求。他们是那些奋斗不息以至最终成为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人。他们被驱使着要去发现这些天真的问题的答案。当他们找到答案时，这些答案却只是引起了更多的问题，因此他们就被这些问题缠

住，这些问题成了他们自己毕生专门研究的问题。荣格就是这种人其中的一个。

当荣格在 82 岁开始写自传时，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的一生是一部无意识自我实现的历史”。重要的在于他写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无意识，而不是我的无意识，因为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是人类普遍未知的东西，它们一代又一代地在世界上寻找着化身。在回顾他的一生时，他写道：“就我而言，一定是有某种朝向理解的强烈欲望带来了我的诞生。因为这是我的本性中最强烈的因素。”^[1]他承认我们天生都有一种“想要认识的需要”，但他觉得在这一方面他有一种特殊的天赋。

这种特殊的天赋使他能够感知到在典型事件背后发挥作用的那些原型模式。他经常承认的原型是超越的，不能被描述的，因而其本身是不可知的。这个事实只不过增强了原型对他的吸引力。

荣格的认识论使命——他想要认识的需要——使他对有灵知的事物（Gnostics）始终有强烈的爱好。诺斯替教（gnosticism）这个早期基督教派别（古希腊的智者，一个能认识事物的人）认为，必须把灵知（知识）和智慧及一般知识区别开来，因为灵知不同于其他各种知识：它不是从普通的来源或通过感官获得的，而是通过特殊的启示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的。荣格相信，他在青少年时代在对巴塞尔大教堂的屋顶上净化的上帝的幻想中获得了这种启示。而且这使他不能忍受他的父亲在面对自己失去信仰时的胆怯。每当荣格与他争吵时，他的父亲就变得很烦躁并转攻为守地说：“你总是要去想”，他往往抱怨说，“一个人

不应该去想，而应该信仰。”荣格却不能容忍这种观点：“不”，他认为，“一个人必须去体验和认识！”与他的精神上破产的父亲的这些心灵遭遇使荣格更坚定了对诺斯替教的信念——当一个人献身于认识和体验精神的现实时就更要坚定这种信念。^[2]

事情的发展也需要进行检验和探究。尽管深受弗洛伊德的吸引（弗洛伊德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是他父亲的对立面），但荣格从不承认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的精心阐述是对已确立的智慧的绝对正确的说明。他必须对它们进行检验，最初是用字词联想测验，后来则通过他对精神分裂症的观察及其对神话学的研究。尽管弗洛伊德极其不高兴，但荣格还是对精神分析的两个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即（1）力比多完全是性欲的（荣格则认为并非如此）；（2）无意识完全是个人的，是个体所独有的（荣格逐渐认识到无意识比这包含得更多，所有的人类都享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结构）。

荣格发现，精神分裂症的幻想具有神话上的类似性，这一发现对他来说是一种理智上的分界线。这使他坚信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如此狭隘的个人至上论，以至于使他看不到由于我们的人性而使我们大家所共享的超个人精神的存在。荣格称之为自然心灵，这是我们私人的世界基于其上的一种动力学的和普遍性的基础。界定和确立使个人的觉知得以发展的这个基础成为吸引他的余生的一项任务，而且他关于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假设是一些“指导性的虚构”（用阿德勒的术语），在他和弗洛伊德决裂之后，这些“指导性的虚构”使他能够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

当荣格宣称原型——自然心灵的基本单位——基本上是不可知的时候，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它们是不可直接认识的。在荣格看来，私人的体验、内在的认识、灵知（神秘的直觉）是原始的。所有其他事物都是推论的，其中一个原型的存在只能从它在神话、精神症幻想和梦、尤其是“大”梦或像人类学家们所谓“文化模式的梦”中的表现推论出来。

荣格本人于 1914—1918 年间在中立的瑞士所进行的“无意识实验”，后来在他对西非的埃尔贡地区和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的考察中得到了证实和解释。在他看来，这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三个关键假设的有效性：（1）精神是主要的论据——不仅是心理学的而且是我们生命的主要论据；（2）它是客观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建构我们的精神或者决心要使它存在：它是先验地存在的，是自然的或进化的产生；（3）客观精神的基本单位是原型——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它为我们整个一生中的舞蹈设计了基本的动作模式。正是这种原型，而不是我们的意识自我在承担后果和发号施令，正如马修·阿诺德所理解的：

我们一降临人世——便带着
一种偏见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
而且在这里时，每一种新的东西
都会影响我们接近真理；
我们并未发号施令，
我们的存在必须保持和谐。

——埃特纳上的恩培多克勒，1852 年

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作为荣格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原型具有可与牛顿物理学中的地球引力、爱因斯坦物理学中的相对论，或达尔文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相比拟的重要意义。它是心理学的量子论：是 20 世纪出现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具有深远的含意——虽然这些科学的实践者们是慢慢地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们正开始很快地赶上来。

赫拉克利特曾公正地观察到，“每一事物的真正构造都习惯于把自己隐藏起来。”正如物理学家研究粒子和波、生物学家研究基因一样，心理学家的领域就是研究原型：因为原型是组成集体无意识的功能单位，而且他们在一起组成了“人性的古老遗传”。荣格把它们描述为“以不可见的方式决定个体生活的一种活生生的反应系统和能力倾向”。[3]

这一系统阐述的问题是，对社会科学家和学术机构来说它具有太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因而难以被接受。结果，荣格对其原型理论的宣布从未得到它所应该得到的值得注意的承认。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为了理解造成这种忽略的原因，我们必须简要地回顾一下自达尔文时代以来思想观点的发展史。遗憾的是，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太迫切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观点，把这些概念误用作政治现象中的为生存而斗争和适者生存，从而引起了众所周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声名狼藉的运动。毫

无疑问，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了有害的运用。帝国主义者用它来证明消灭原初的居民是合理的；希特勒用它来支持其统治世界的幻想并证明他对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合理的；犯罪学家把它用作支持死刑和阉割的一种论点；优生学家把它用作选择无痛苦致死术的一种正当理由；而军事家们则把它到处用作发动战争的一种正当理由。

由于这些罪行录使其丧失了信誉，因而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厌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各个方面，它应该引起人们在研究人类心理学时对生物学概念的拒绝。于是，钟摆艰难地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而且“先天的东西”成了全世界所有的大学系科中一个禁忌的主题。自由主义就意味着环境论、行为主义和白板论的极点——在这块空白的板上生活可以通过某种脱离现实的奇迹设法铭记下它的所有教训，而不会受到来自进化的过去的任何抵抗。

随着钟摆的摆动，于是钟表也就向后转去——回到了为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智传统如此钟爱的前达尔文时代的经验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概念都是从经验中获得的，“先天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起任何作用。人类的心灵是怎样“装备着如此大量的储藏，使人的繁忙而无限的创造力在上面绘出图画的”约翰·洛克这位主要的经验主义者问道。他自己回答说：“一句话，是从经验中获得的。”^[4]

在这种气象中，荣格的观点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听取，他也就未曾得到过。他白费力气地申明他并不是在为先天的观点辩护。他说，原型并不是被遗传的观点，而是被

遗传的观点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任何生物学家都会发现可以接受的声明，但直到最近还没有心理学家接受。荣格不仅没有得到同情的听取，反而被谴责为法西斯分子，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和一个纳粹的同情者，而问心无愧并且在为自由民主服务的行为主义者却继续提出他们的“学习律”，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世界上每一位专制的人都会果断地滥用这些规律去折磨、洗脑和威胁他们的不幸的被试。“当然，行为主义是起作用的”，W.H. 奥登哼着鼻子说，“折磨也是起作用的。给我一个决不胡说八道的、实事求是的行为主义者，几片药和一些简单的电器械，在六个月之内我将使他当众背诵阿他那修斯信条”。[5]

虽然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它，但荣格关于原型的假设实际上超越了天性对教养的争论，并且愈合了笛卡尔对身心二元的分裂。他不仅提出原型结构对于所有生命有机体的存在和生存都是基本的，而且认为它们是连续的，也具有控制无机物行为的结构。原型不仅是精神的实体，而且是“通往一般物质的桥梁”。正是原型的这种“类精神的”方面才被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所采纳，他相信这对我们能够理解宇宙据以形成的原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6]

既然原型是所有存在的先决条件，它们便表现在艺术、科学和宗教的精神成就中，也表现在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组织中。这样，原型就为人们共同理解从所有科学和所有人类活动中获得的资料提供了一种基础——这决不是因为它对认识论的意义，对研究认识本身的意义

原型的表现形式

既然诸如此类的原型是不可知的，那么，它们的存在就只能从它们的表现形式中推断出来。使心理学家们最感兴趣的表现形式是在生命循环过程中原型所引起的那些典型的人类属性——在任何地方的人们当中都会出现的类似的思想、意象、神话传说、情感和行为模式，不论他们的阶级、宗教信条、种族、地理位置或历史时代如何。

荣格写道：“虽然正在变化的生活情境必然会无限多样化地出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但它们可能的数量决不会超过某些自然的限制；它们陷入或多或少的典型模式中，这些典型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它们自己。无意识的原型结构相当于事态的平均趋势。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改变并不是无限多变的；它们是在数量上有限的某些经常发生的事件的变式。因此，当某一种令人痛苦的情况出现时，相应的原型就会在无意识中群集起来。由于这种原型是超自然的，意即具有某种特殊的能量，它将把意识内容——使之能够感知到的，因而能够在意识中实现的有意识的观念——吸引到它自己身上。”^[7]

至于原型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这实际上可以从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不断地重新发现这一假设并以他们自己的一套术语重新予以宣布的方式中推断出来。这类实例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在这里只能考察其中的一部分。我将使自己仅限于提供可在人类学、行为生物学、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心理语言学中发现的原型功能的

实例。

人类学 普遍的文化特征和原型社会

有一条原则我认为应该把它提升到人类学的基本规律的地位,而且我很高兴地说明,在伟大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去世之前不久我能够使我相信这条规律是有效的。〔8〕这条原则可作如下说明:每当人们发现某种现象具有所有人类社会的特点时,不论文化、种族或历史时代如何,它就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某种表现。

事实上,所有的文化,无论其地理位置或历史时代如何,都表现出大量的社会特点,这些特点本身绝对具有某种独特的人类文化的特征。乔治·默多克和罗宾·福克斯已经独立地把这些特点按目录做了分类。按照这些人类学家的观点,已知的人类文化中,没有一种文化形态缺少关于财产的法律,没有解决争论的程序,管理求婚、婚姻和通奸,与食物和乱伦有关的禁忌方面的规则,规定问候的形式和称呼方式的礼节方面的规则,关于工具和武器的制造,合作劳动、访问、盛宴款待、好客、奉送礼物、葬礼仪式的举行,信奉超自然的事物,宗教仪式,神话和传说的讲述,舞蹈,心理疾病,信仰治疗,释梦等方面的规定。〔9〕

所有这些普遍的行为模式都是原型在发挥作用的证据。关键在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生活中所经验到的东西并不是仅仅由我们个人的历史决定的。它也基本上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集体历史指导的。这个集体的历史在集

体无意识中被译成生物学密码，而且这个密码的起源在如此遥远的过去，以至于被掩蔽在进化时代的原始雾霭之中。

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的原型天赋指导和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命循环——降生和受到母亲的照管、探索环境、对陌生人表现出警惕性、在同伴群体中玩耍、作为社会团体的成年的一员而被介绍进来、在社会等级中确立一个地位、在进行狩猎和对群体外部进行战争时男子之间的结合、求爱、结婚、哺养孩子、参加宗教仪式、承担高度成熟的社会责任以及为死亡做准备。荣格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格言中对所有这一切做了总结：“归根结底，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我们人类的永恒生命。” [10]

跨文化的证据在其含意方面是吸引人的和势不可挡的。但是，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人类学家们对普遍的文化特征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却宁愿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把这些差异不是同生物学因素联系起来，而是同儿童哺养的实践活动和地理的、气候的以及经济的特点联系起来。这又是支持环境论和敌视进化论生物学的学术偏见的一个实例。但是，一直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荣格在小休宁根长大成人以及后来在巴塞尔上大学的那些年月里，一个名叫阿道夫·巴斯蒂恩的德国人类文化学家在世界各地游历，研究大不相同的各民族的神话、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给巴斯蒂恩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注意到，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所遇到的主题之间都有类似性，他称之为基本观念(Elementargedanken)，这些观念始终不变地以当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他恰好在当时正进行研究的

那些民族群体所特有的表现形式。他称之为少数民族的观念。^[11]

巴斯蒂恩的发现与荣格的发现是一致的。荣格认为，原型构成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据以设计出它们自己的个别变式的基本主题。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非常高兴地没有意识到这些基本主题的存在，而相信我们个人的表达完全是由我们自己制造的。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也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普遍的文化特征和其中所隐含的无意识过程。他写道：“如果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于把形式强加到内容之上，如果这些形式对所有的心灵来说都是基本相同的——古代的或现代的，原始的或文明社会的”，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一个对所有的风俗和习惯都有效的解释原则。列维-施特劳斯和他所属的人类学派最终所关注的是“集体现象的无意识本质”。在这些集体现象之中并且为这些现象负责的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谓无意识的基础结构。这些概念和荣格的原型有如此明显的联系，因而无需再做进一步的评论。但奇怪的是，列维-施特劳斯却总是假装无视荣格的理论。正如尤金·达基利和保罗·库格勒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样做时他完全歪曲了荣格的观点。^[12]

例如，列维-施特劳斯谴责荣格认为原型与精神内容是一致的，但和其中所隐含的无意识形式不一致，认为荣格在生物学上是天真的。事实上，荣格的观点和列维-施特劳斯指责他的观点恰恰相反。正如荣格早在 1935 年就写出的：“有必要再次指出，原型并不是根据它们的内

来决定的，而只是根据它们的形式，而且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决定的。只有当某种原始意象成为有意识的并且因而用意识经验的材料填补上时，这种原始意象才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和纯粹形式的，它除了是一种 *facultas Praeformandi* 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是。”^[13]

正如库格勒有说服力地评论的那样：“荣格对于无意识中的形式关系的描述比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要早近 15 年！”法国的结构主义和荣格的心理学都认为，“无意识的基本功能是把形式（基础结构、象征功能或原型）强加到内容上，特别是强加到神话、梦、社会风俗、心理病理学和语言上”。^[14]

在美国的人类学家中，实际上进化论取向的惟一提倡者是拉特杰斯大学的罗宾·福克斯和莱昂内尔·泰格。他们蔑视在 20 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困扰着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福克斯询问道：“没有常量我们怎能研究变量？人类学家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在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中碰到过在各种各样的象征的伪装之下进行的类似的过程吗？”福克斯的态度非常接近巴斯蒂恩的态度；他论证说：“人一旦识破表面的表现，人类社会安排的一致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和荣格一样，福克斯认为人类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一束潜能”。他继续说道：“这些潜能或先天倾向或偏见是人类所独有的自然选择过程的最终产物。”进而，“人拥有他所拥有的各种文化和社会，因为他是他所属于的那种人。”^[15]

福克斯的声明像不证自明的公理一样令我吃惊，但这些声明除了使他受到其同伴的辱骂之外，并没有给他带来